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两极格局的险因：代理人战争和中国的崛起

The Perils of Bipolarity: Proxy Wa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马克·伊斯利博士，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Mark O. Yeisley, Ph.D., USAF）

纵观历史，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为生存而竞争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单极形态，只有一个国家占据霸主地位；[1] 二是双极形态，两个国家控制了大部分权力，而弱小国家则分别与其中之一结盟；三是多极形态，三个或更多的国家强大到足以构成权力多极的国际体系。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多极形态是常态，总是有若干大国抢夺强权。大国的兴衰此起彼落，当某些国家感到权力不平衡时，便以战争改变格局。历史上也有双极形态的例子，但都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2]

许多学者认为，自 1991 年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单极趋势，美国成为现存唯一的“超级大国”。[3] 但预测未来国际关系的走向也许更为重要。例如，有些学者相信美国在短期内不会遇到有力的挑战者，因而单极可能是一个稳定的长期形态。[4]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将返回到多极格局，许多国家将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被认可为大国。[5] 还有一些学者则预见两极格局再现，美国将和一个未来的大国再次争夺主宰权。[6] 在国际体系内，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对两极格局再现的可能性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只有中国即将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用于增加军事开支和扩充军事力量，不久将开始与美国较量。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新的双极国际格局中的第二个超级大国。

对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今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学者们各呈己见，各方都在探讨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是否无法避免。但是，这场争论并未考虑美中关系最可能出现的未来前景。与中国的直接冲突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很遥远。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诉诸代理人战争，与中国在非洲争夺资源，从而导致这块大陆上的国家内冲突。这些冲突将对美国所有的力量工具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美国将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地区的受援国国内协防，尤其是参与它们的平叛作战。两极格局和重新诉诸代理人作战形式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长远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而这些战略目前侧重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随着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常规冲突转移到较为低端的作战行动，防务采购和军事作战准则都将受到影响。

为帮助理解本文观点，我们必须先定义“国内性和代理人冲突”，并解释为何两极格局中的核国家要做出通过代理人战争进行竞争的战略政策选择。美国和苏联从 1946 年到冷战结束期间对这种性质的冲突乐此不疲，这段历史很说明问题，尽管这些冲突主要涉及意识形态，而不是资源。本文的下一部分将探讨我们为何认为中国不久将能在新的两极格局中挑战美国，并且美中两国之间的代理人冲突将会随之增加。然后，我们将探讨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总体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影响，以及防务采购计划和未来作战准则的制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订如何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在建议和结语部分，我们将探讨对今后几十年战略规划的若干建议。

过去的两极格局、国家内冲突和代理人冲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世界各国之间仍然发生了数以千计的冲突，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类冲突相对少些。根据记录，自 1946 年以来共发生了六十一次国家间冲突，其中只有五次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的。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冲突，从地方性暴乱到内战，在 1946 年至 1992 年期间大幅增加，但在冷战结束后显著减少。国家内冲突数量的起伏真实地反映了苏联与美国之间“代理人战争”的状况，“代理人战争”是指“大国通过客体国表达相互间的敌意”，表示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既有的核威慑态势框架内借助这些客体国追求其战略和意识形态目标。[7]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不引发核战争的前提下实现战略性的国家利益和其他政治目标。苏联在走向衰败的年代，不再有能力资助这些战争；稍后不久，美国也终止了对许多承诺的支持。[8] 由于资助减少，那些前客体国和国内派系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谈判或决出胜负来解决相互间的冲突。

学者们推崇两极格局内在的稳定性；但是这种观点主要依据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和国家间战争爆发次数较少的事实。[9] 确实，与之前的时期相比，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可以说比较和平，因为国家间的大型战争相对较少，而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军事冲突。冷战时期国家间关系稳定确实是两极格局造成的吗？或者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十七世纪，英国和法国都是超级帝国，但是双极格局未能阻止这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然而在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却未走向军事冲突。[10] 究其原因，是这场冷战中独特的双极形态，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足够的核能力，倘若爆发核战争，后果不堪设想。有些学者提出是美国的威慑和遏制战略成功阻止了军事冲突。[11] 另一些学者引用“稳定—不稳定悖论”，认为核均势排除了拥核国之间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仍然使得这些国家能发动有限的常规冲突。[12]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核武器对冷战时期的和平根本不起作用。[13] 其实，真正阻止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是争霸双方在双极国际格局的核均势中都认识到战争的代价太高。美国和苏联于是改用其他战略，在客体国内通过代理人间接展开斗争以解决意识形态分歧。尽管此等战略可以说是冷战之所以“冷”的原因，但是超级大国决定通过代理人参与国家内冲突，背后有什么习惯性的逻辑在起作用？

国家内和代理人冲突

就像国家间冲突从经济制裁到军事行动等有多种形式一样，国家内冲突也以各种形态表现。内战往往始于民间草根团伙，然后发生暴动、暴乱和叛乱，最终成为叛乱群体和国家武装部队之间的公开战争。这类例子的特征是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边界内发生冲突，尽管也有跨越国境发生冲突的事例。[14] 自 1946 年以来，此类国家内冲突越来越多，有些甚至持续五十年或更久（参看以下图 1）。在 1946 年至 2007 年期间，叛乱团体和国家武装部队之间发生了 225 次冲突。[15]

国家内冲突的数量在 1992 年达到高峰，但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急速下降；2007 年的持续冲突数量与 1970 年代的数量相近。[16] 国家内冲突数量的变化模式很自然地引发两个相关问题：冷战时期持续的国家内冲突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随后二十年里国家内冲突又急速减少？通过检视每个超级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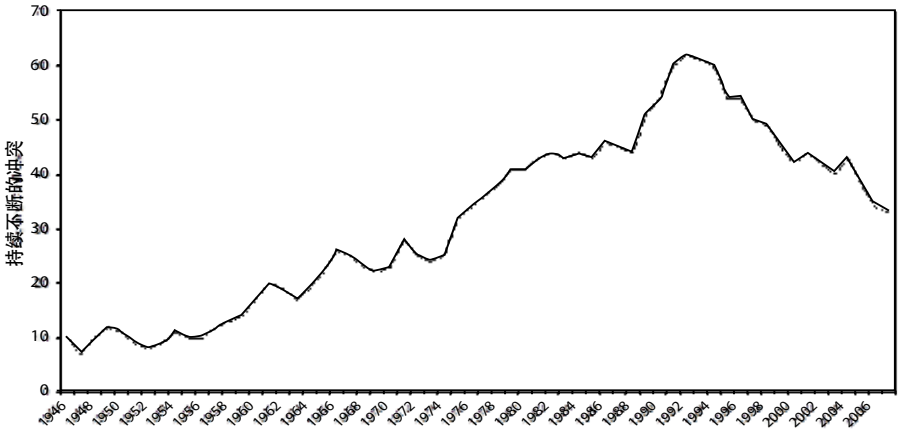

图 1：1946-2007 年国家内冲突持续不断

在冷战时期所做的战略性外交政策抉择，可回答这两个问题。

如上文所述，代理人冲突是大国通过客体国表达相互间的敌意，而不是大国之间直接冲突。当国家之间对具体问题有争议，但又不愿意直接冲突时，则会发生代理人冲突。冷战时期的多数国家内冲突是美国或苏联因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而支持的代理人冲突。我们还必须看到，认知的力量平衡和实际的军事均势同等重要，这导致战略的设计既依赖对力量平衡的认知也依赖力量平衡本身。[17] 因此，美国政策把苏联的任何收益都视为对美国的威胁，必须在零和现实政治外交游戏中加以反制。

冷战中的代理人冲突，通常以大国采用向叛乱部队或国家武装部队提供援助，诸如输送现金、提供武器 / 技术以及顾问或作战支持。尽管美国和 / 或苏联对冲突国家的许多援助仍在保密之中，目前无法举证，但是仍有许多可以判明的援助事例。在冷战时期，有几十个国家内冲突是美国或苏联的代理人战争，其时间分布耐人寻味。将近一半的此类冲突发生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处于上升势头的头二十年，冲突数量在 1980 年代下降，因为苏联的经济援助逐渐缩减，而且美国也很快效法，减少了对这些国家的援助。[18] 因此，在可能发生核毁灭的冷战双极格局下，国家间冲突的代价太过昂贵而迫使大国之间维持和平，但是这种局势却通过两个互补的机制增加了代理人发动国家内冲突的次数。一方面，超级大国借助代理人冲突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而不必担忧引发核战争；另一方面，客体国内的受援派别也借助这种冲突实现其目标，必要时不惜诉诸暴力。

为什么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以代理人冲突方式来交手？何况冷战时期的现实派曾经对这种做法提出警告，声称插手第三世界的冲突会伤害美国利益，亦无助于增强至关重要的力量平衡。[19]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国宁愿通过代理人进行竞争，不需要直接冲突就可获得其战略利益，并通过软实力战略培植善意。[20] 但是，历史纪录并不支持这种解释，因为历史上经常发生大国间的直接争斗。一个比较可信的解释则在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的结构条件。随着美国和苏联达到核均势，核毁灭的危险成功地阻止了双方进行直接冲突。但是每一方都试图尽一切可能传播其意识形态，以尽量扩大其联盟范围和实现最高安全的现实政治目标。[21] 现实派的政治目标

与核均势的现实相结合，促使每一方避免直接对抗，改为通过客体国内的代理人冲突实现其目标。

冷战期间一些典型的代理人冲突

冷战时期最早的国家内代理人冲突是希腊内战，一方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支持的共产党人起义部队，另一方是美国和英国支持的希腊军队。[22] 美国还资助和装备了 1954 年危地马拉政变部队，该次政变推翻了古兹曼总统，最终却导致长达 36 年的内战。[23] 西半球的其他例子还包括古巴革命、萨尔瓦多的长期内战（美国支持萨尔瓦多政府军打击左翼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资助。[24] 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许多非洲国家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于是在非洲也开始发生多起冷战代理人冲突。[25]

安哥拉内战也许是最臭名昭著的冷战代理人冲突，该场内战在 1975 年爆发，一直打到 2002 年，估计战争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在这场冲突中，美国以金钱支持安哥拉全面独立民族联盟叛乱部队，而古巴军人则作为苏联远征军参战，支持安哥拉的共产主义政府。[26] 其他例子还包括苏联提供武器给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以及美国和苏联分别支持莫桑比克内战各方。[27] 亚洲的例子则有美国支持圣战者游击队在阿富汗抗击苏军，以及美国参与越南战争。[28]

有些冲突旷日持久，也有许多冲突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支持随着政治丑闻在美国曝光而终止；两年后，内战双方通过谈判握手言和。[29] 莫斯科在 1990 年终止对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的所有支持，不久后，该政权被叛乱武装撵下台。[30] 大国停止支持安哥拉冲突之后，安哥拉全面独立民族联盟和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很快达成和解协议。[31] 在上述历史时期，许多冲突可以说是因两个超级大国的外部支持而挑起，并且肯定是由于外部支持而僵持不下；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外部支持实际上是叛乱成功的必备条件。[32] 尽管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些冲突中并无直接利益，但是它们都想要在核均势格局内解决意识形态分歧，因而制订了相应的国家安全政策，将现实政治和国内安全考量移到国外战场上，卷入代理人冲突。

由此来看，国家内冲突在冷战时期增多而在当前时期减少是因为受到超级大国决策的影响，超级大国意图通过客体国内的代理人冲突实现其战略目标，从而避免代价昂贵的核战争。苏联由于丧失资助这些代理人战争的经济能力而停止提供援助，美国亦相应地终止援助。尽管不可能证实丧失援助是后冷战时期许多冲突得以化解的主要促成因素，但是失去支持很有可能迫使敌对双方寻找其他资助来源或走向和解。自 1990 年以来，决出结果的冲突比例几乎是冷战时期的三倍，其中许多冲突似乎选择了化干戈为玉帛的道路。[33] 就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关系而言，目前的单极环境似乎更加平和。但是，现在有好几个国家显示出有能力取得大国地位；如果这些国家中有一个能拥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与美国抗衡，则可能再次出现国际两极格局。

目前的单极格局及面对的可能挑战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可以说都拥有在未来某个时候上升到大国地位的潜力，但是只有中国拥有在近期内坐大的能力和意志力。下文讨论将中国视为最可能与美国抗衡的下一个竞争对手的理由，以及这种竞争在国际两极格局中出现的方式和原因。此外，下文还将探讨随着美中两国未来在非洲对稀缺战略资源的争夺，

美中两国间的竞争将如何导致以非洲为重点的国家内代理人冲突再次加剧。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爆炸性增长，超越日本，在 2010 年第二季度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34] 在美国目前仍不见起色的经济危机中，美中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经济增长仍然如蜗牛爬行，而中国经济则继续保持 9% 的年增长率。中国已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积极获取先进的攻防能力。[35] 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导致防务支出削减，从而可能使两国的军事能力也逐步接近。[36]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众多的人口资源相结合，必将使其在近期内成为超级大国，可与美国抗衡。

现在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详述中国将上升到超级大国地位，以及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37] 鉴于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人们很自然地会质疑中国崛起是否会走向美中冲突。其实这种可能性很小，主要是因为世界将重新回到双极环境中的核均势格局。[38] 有些人担忧中国越来越需要进口燃料以支持其日益扩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显然并不在乎其贸易伙伴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中国愿意与伊朗和苏丹等国家来往，可能导致美中关系恶化。[39] 中国持续推行军事现代化，其目的之一似乎也是想遏制美国在近期内威慑中国的能力，美国的战略重点是通过地区阻截或控制关键的东半球海运航道而干扰中国的石油供应线。

中国正在通过军火转让和利益诱导来扩大其地区联盟网，从而可能筑起美国很难突破的联盟长城，藉以保护中国在东半球的利益。[40] 中国还会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保护这些利益。有些学者断言 1996 年台海危机表明中国也许准备通过先发制人的攻击强行占领台湾。[41] 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邻国欢迎中国提供给它们的经济发展机会，并且相信中国的意图是和平的，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而不是地区霸权。[42] 鉴于目前不可能有任何试图抗衡中国崛起的地区性行动，至少短期内不会有，美国作为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责无旁贷地应承担这项责任。尽管美国仍然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是事态发展趋势似乎表明，随着中国的地缘战略影响日渐扩大，美国将发现同中国争夺战略资源会越来越困难。

未来的两极格局、核武器作用和美中在非洲的代理人冲突

中国可能在今后二十年内获得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经济实力，然后是军事实力。目前，中国拥有 240 枚核弹头和 135 枚能发射到美国或其盟国的弹道导弹。据估计，到 2020 年代中期，核弹头的数量将翻倍。[43] 如同冷战时期一样，在两极格局中，美中直接交战的代价太高，因而两国的政策将寻求在其他地方解决冲突。[44] 但是，为什么崛起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与美国的地缘战略竞争？这种竞争最有可能在哪里发生？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未来美中竞争的核心将是战略资源，而不是意识形态，因而新的“大型竞逐”最有可能在非洲决一胜负。

尽管中国政府由共产党控制，中国对传播中国式共产主义没有兴趣，而是在其需求方面采取更实用主义的态度——保障资源供应，满足国民需求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45] 有些学者估计中国将在 2015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崛起的大国往往会采取必要步骤“保障市场、原材料和运输路线”。[46] 中国是全球铝、铜、铅、镍、锌、锡和铁矿石的主要消耗国，其金属需求量目前占世界总需求量的 25% 以上。[47] 相比之下，从 1970 年到 1995 年，美国对包括金属在内的所有原材料的消耗量占全球总消耗量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人口仅为全球总人口的百分之五。[48] 根据国际能源署公布的资料，中国

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09 年的石油、煤和天然气消耗量超过美国。[49]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国，美国和中国必须寻求能满足其未来资源需求的外交政策妙方。美国可以通过生物或煤基燃料、氢基燃料或天然气替代燃料，缓解一部分能源需求，而中国至今缺乏使用替代燃料的技术，仍然主要依赖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由于这些需求大多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因而竞争必然是零和游戏，并将通过所有可能的实力手段来争夺。[50]

非洲拥有大量的矿物和能源资源，大部分仍未开采。七个非洲国家拥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蕴藏量，其中四个国家还有大量的天然气蕴藏。[51] 非洲还有丰富的铝土(用于制铝)、铜、铅、镍、锌和铁矿石资源，而中国正在大量进口和急于获得这些资源。最近在非洲发生的一些事情说明中国正在寻求更多的自然资源获取途径，在许多非洲国家积极推行中国开发计划。最近，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南非允许中国帮助其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南非出口到中国的锰、铁和铜在非洲占第一位。[52] 中国在非洲不全是获取资源，非洲大陆为中国商品提供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出口市场，也给予中国在非洲扩充软实力的一个论坛，有助于展示中国的援助不同于附带政治和经济条件的美式外援。[53]

争夺非洲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对其丰富石油蕴藏和其他能源资源的公开获取。例如，中国在苏丹有 4,000 名军人保护其能源利益和矿产投资；中国还拥有大尼罗河流域石油生产公司 40% 的股权。[54] 据估计，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有百分之四十来自非洲。[55]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亦有增长，在过去十年，贸易额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在 2002 年至 2004 年期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翻倍，按总贸易额计算，中国是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中国投资也在增长，非洲各地有 700 多家中资企业在运营，资产总额超过 10 亿美元。此外，援助和直接经济支援增加，中国已豁免大约三十一个非洲国家的债务。[56]

综上所述，非洲是中国人的一项重要海外利益，因而也必须成为美国的重要海外利益；获取非洲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对于美中两国的生存都至关重要。[57] 尽管美中两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资源的不可再生特性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竞争将始终是一场零和游戏。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在最近五十年里才取得独立地位，巩固健全的国内体制和维持稳定的政府仍是难题。[58] 研究显示，软弱的政府往往是国内冲突的首要目标，而要控制这些冲突则需付出高昂的代价。[59] 许多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但是政府软弱无力，容易引发国内冲突，因而很有可能会寻求中国或美国的援助，藉以解决国内纠纷。获得非洲资源对于美中两国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中两国可能通过代理人进行相互竞争，分别向对立的一方（或两方）提供外交、经济或军事援助。

因此，上文中现实派声称关注第三世界问题是不妥做法的论调，其实是错误的；在未来美中两极格局中，直接战争的代价将和冷战时期一样，仍会很高。而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弱不禁风，国内纠纷往往可能导致内部冲突；于是美国和中国将各自以自身战略利益为主导，采纳既审慎又活跃的插足非洲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和中国想要维持各自的国家安全态势，尤其是在战略防卫方面的态势，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很可能会发生争夺非洲资源控制权的代理人冲突。[60] 这对未来的美国总体战略和军事战略、外交政策指导方针、未来防务采购优先顺序、军事作战准则和训练有何影响？

对美国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 2010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抛弃了前届政府依赖预防性战争和使用武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而注重依靠国际体制和强大联盟来构建更加和平的世界，重建全球经济体系，限制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和对抗恐怖主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部文件认为美国必须：

> “……平衡和整合所有的美国实力要素，并且提高我们的国家安全能力，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需要。我们必须保持我国武装部队的**常规优势**，同时增强击败非对称威胁的能力。”[61]（粗体强调为作者后加）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目前的单极国际格局将保持不变这个假设。如果未来出现新的两极格局，中国在新格局中与美国争夺稀缺的资源，则今后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必须反映这种竞争行为的性质。

美国目前的防务预算需要大约 6800 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防务预算总和。为了支持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就必须把重点放在维持常规军事优势，即需要购置支持传统型正规兵团作战的军事装备。[62] 但是，美国也必须确保能获得战略资源；而且，一旦发生非洲国家内代理人冲突，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未来的挑战。尽管维持目前的作战能力是必要的，但是现行常规战略过分强调打一场终极战争。如果美国想要维护获取战略资源的机会，藉以保持其在未来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它必须提高应对可能在非洲代理人冲突中面临的非对称威胁的能力；在那些冲突中，对受援国的国内协防支援意义重大。未来争夺非洲资源的冲突是非对称性的，因此防务采购必须注重装备和训练受援国国内军事和民间防务组织。与此同时，军队和民政行动方针都必须修改，以指导周密和有效的机构间协同行动，共同应对代理人冲突所呈现的覆盖整个战争频谱的各种挑战，即协同开展从援助安全部队、平叛、获取信息、武力战斗，直至维和及战后维稳的各种行动。

建议和结语

常理认为，如果美国停止参与近年的平叛作战，恢复常规战备，以正面迎击崛起的中国，将对美国有好处。[63] 但是，美中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美国应该减少强调维持常规兵力优势；它已经遥遥领先，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在近期内挑战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应该调整采购和训练计划拨款，注重应对未来的非对称国家内战争。机构间协同支持受援国国内协防已见成效且步入正轨，但是必须继续修订涵盖省级重建团队和机构间合作及第四阶段行动的作战准则。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后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经济危机导致资源捉襟见肘，无疑将迫使防务预算进一步缩减，从而需要加强机构间协同参与。

依赖“一切如常的”常规战争来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将使得宝贵的防务资源无法用于应对美国在获取外国战略资源方面、尤其是非洲战略资源方面日渐迫近的危机。将经济援助和建立民主体制捆绑在一起，也是失败的战略；相反，美国必须使用其软实力来说服非洲国家与我们合作。现在该是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了，否则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将达到无法逆转的程度。如果美国想要确保今后能从非洲满足其资源需求，就必须准备好使用所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要素，应对今后非洲大陆代理人冲突的需求。

目前，美国拥有独特的地位，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是这个单极时代可能

不会长久。中国拥有独特的条件，能够将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转换成足够的军事资源，成为地区霸主。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必须尽力从海外获得战略资源，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两极格局中，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美国都需要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对这些资源的竞争涉及美中两国生死存亡的战略利益。

此等战略利益是否必然会导致美中两国将来发生冲突，学者们对此仍争论不休，但是目前美国防务政策的要点仍是准备常规冲突。本文提出另一种战略上合理的未来格局，这就是美中两国将通过代理人战争，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持续争夺战略资源。尽管美国不应该减弱现有的常规战争战备优势，从深谋远算的角度出发，美国也需要为今后在非洲进行代理人冲突做好准备。

经济危机持续不退，如果美国想要减少国债负担，无疑必须削减今后的防务支出。这将必然导致进一步调整战略、军队与民间机构协同行动的作战准则及训练计划，否则无法成功地应对今后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受援国国内协防作战的挑战。如果美国想要在与中国争夺战略资源的日渐迫近的挑战中获胜，就必须尽快开始准备。如果不做好基于代理人战争的准备，则与中国的未来交战在所难免。♣

注释:

1. 我对单极格局的定义与 Christopher Layne 在“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单极幻觉：为何新的大国将会崛起](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4), 1993, 5) 一文中的定义相似，他认为在单极格局中，单一的大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可阻止任何与其抗衡的企图。
2. 雅典和斯巴达争斗是早期的例子，十六世纪腓力国王统治的西班牙和法国竞争以及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竞争也属于这类例子。
3. 例如，请参看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单极时代], (Foreign Affairs 70 (1), 1990); William C.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单极世界的稳定性],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1999); Michael 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维护单极时代：冷战后的现实主义理论和美国总体战略],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4), 1997). 另请参看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ase against Unilateralism”[国际关系理论和反单边主义案例],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 (3), 2005), 尤其是其中对单边主义的辩护。
4. Christopher Layne 在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和平幻觉：1940 年至今的美国总体战略](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4-35) 一书中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称为“单极乐观主义者”，他们声称美国的硬实力使得其他国家不可能与之抗衡，因为涉及的代价太高。
5. John J. Mearsheimer 所著的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大国政治悲剧](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2001) 即是一个实例，他在该书中警告可能重新出现多极形态的国际冲突。
6. 见注释 1 中 Layne 文，第 5-51 页。
7. 尽管代理人冲突的定义不尽相同，我认为 Dillon Craig 在“State Security Policy and Proxy Wars in Africa - Ultima Ratio Regum: Remix or Redux?”[国家安全政策和非洲的代理人战争 — 国王的最终手段：重新拌和或回归 ?] (Strategic Insights 9 (1), Spring/Summer 2010, 2) 一文中引用的定义最有用，他还扩充了该定义。
8. 例如，请参看 Alex Thomson,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Politics [非洲政治概论],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60).
9. 关于所谓的双极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详细论述，请参看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理论], (Boston: McGraw Hill, 1979).
10. 地区性双极形态的其他例子（例如雅典与斯巴达，以及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与法国）也是冲突性的。
11. 关于冷战时期美国总体战略演变过程的评估，请参看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分析评估],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2. 见注释 4，第 176 页。

13. 例如，请参看 John Mueller,“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核武器的关键非相关性：战后世界的稳定性],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2), 1988, 56).

14 例如，请参看 Jon Abbink,“Proxy War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 in the Horn of Africa”[非洲之角的代理人战争与和平前景],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21 (3), Sept 2003).

15. 冲突数据摘引自 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 Set, v4-2009 [武装冲突数据集], 更多信息见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UCDP-PRIO/.

16. 同上。更多信息见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UCDP-PRIO/

17. 见注释 11，第 90 页。

1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二十年，美国和苏联卷入大量的代理人冲突；到 1980 年代，它们的参与程度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资料来源见 John Prados, Safe for Democracy: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维护民主安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 (Chicago: Ivan R. Dee Publisher, 2006).

19. 现实派 Hans J. Morgenthau 在其所著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国家间政治：权力争夺与和平]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一书中反对美国参与第三世界代理人战争，Kenneth Waltz (1979) 也持有相同观点。

20. 美国对海地的人道援助可视为非军事参与的事例，但是这项援助被委内瑞拉和法国斥责为美国试图占领海地。参看 Barron Youngsmith,“Proxy War: How Haiti Became a Battlefield for the Great Powers”[代理人战争：海地如何成为大国竞争的战场], (The New Republic, January 30, 2010). 另参看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取胜的手段],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此著作也解释了软实力如何在当代增强美国安全。

21. 见注释 4，第 28-38 页。

22. Maria Nikolopoulou, The Greek Civil War: Essays on a Conflict of Exceptionalism and Silences [希腊内战：关于例外主义和沉默之冲突的论文集],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美国对于这场冲突的政策首次见诸于杜鲁门总统在 1947 年 3 月 12 日发表的讲话，当时他声称美国应该“以可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其政治、经济及必要的军事实力防止希腊沦为苏联的客体国。”请参看 John O. Iatrides,“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ece, 1945-9”[1945-1949 年期间的英国、美国和希腊], 收录于 The Greek Civil War, 1943-50: Studies of Polarization [希腊内战 1943-1950 年：极化政治研究], David H. Close, ed. (London: Routledge, 1993, 202).

23. Susanne Jonas, The Battle for Guatemala: Rebels, Death Squads, and U.S. Power [危地马拉争夺战：叛乱分子、暗杀队和美国实力],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70). 另请参看 Guy Arnold, Wars in the Third World since 1945 [1945 年以来的第三世界战争], (London: Cassell Villiers House, 1995, 601).

24. Elisabeth Jean Wood, Insurg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Civil War [反叛分子的集体行动和内战]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 前国务卿亚历山大·海格于 1981 年 2 月 18 日对北约的讲话内容可作为美国意图的佐证，他声称：“我们认为发生的这件事是全球共产党战役的一部分……支持萨尔瓦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摘引自 Martin E. Gettleman (ed.), El Salvador: Central America in the New Cold War [萨尔瓦多：新冷战时期的中美洲],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1). 另请参看 Guy Arnold, Wars in the Third World since 1945 [1945 年以来的第三世界战争], (London: Cassell Villiers House, 1995, pp. 594-99). 关于尼加拉瓜内战，请参看 Roger Miranda and William Ratliff, The Civil War in Nicaragua: Inside the Sandinistas [尼加拉瓜内战：桑地诺政权内幕],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其他信息摘引自注释 23 中 Guy Arnold 著作，第 616-20 页。

25. 见注释 8 Alex Thomson 著作，第 152-53 页，其中描述了苏联对非洲国家支援的演变过程，苏联的目标是在非洲大陆推行社会主义。

26. William Minter, Apartheid's Contras: An Inquiry into the Roots of War in Angola and Mozambique [种族隔离的对立面：探索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战争的根源], (London: Zed Books, 1994); 另参看注释 23 中 Guy Arnold 的著作，第 362-64 页。

27. Richard J. Bloomfield, ed., Regional Conflict and U.S. Policy: Angola and Mozambique [区域冲突和美国政策：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Algonac, MI: Reference Publications, Inc., 1988); 另参看注释 23 中 Guy Arnold 的著作，第 400-11 页。

28. 这并不等于说中东没有代理人冲突，美国对以色列的现金捐赠、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圣战者游击队的支持以及插手推翻伊朗摩萨台政权等，都是美国政策的体现，意在推进西方竞争和构建反苏战略联盟；参看 Beverley Milton-

Edwards and Peter Hinchcliff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1945 年以来的中东冲突], (London: Routledge, 2001).

29. 例如，请参看 John R. Thackrah,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ilitary Conflict Since 1945 [洛特莱奇 1945 年以来军事冲突指南],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2).

30. 同上，第 74 页。

31. Raymond W. Copson, Africa's War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 [非洲的战争与和平前景], (Armonk, NY: M.E.Sharpe, Inc., 1994, pp.114-125). 尽管苏联在 1988 年之前提供大量支援，到 1990 年，苏联不再愿意资助这场冲突；在 1991 年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之后，美国和苏联都削减了资助。

32. Jeffrey Record, Beating Goliath: Why Insurgencies Win [击败巨人：为何反叛分子能获胜],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7, xi).

33. 数据摘引自 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 Set, v4-2009 [武装冲突数据集], 更多信息见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UCDP-PRIO/.

34. 摘引自《彭博新闻》发布的一篇报道，2010 年 8 月 16 日。若需查阅全文，请登录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0-08-16/china-economy-passes-japan-s-in-second-quarter-capping-three-decade-rise.html

35. Jonathan Pollack,“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美国感知的中国军事实力], 收录于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中国威胁：感知、迷思和现实], (New York: RoutledgeCourzon, 2002, 44), 其中列举了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实例。

36. Aaron Friedberg,“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the US-China Rivalry”[经济危机对美中竞争的影响], (Survival, 52 (4), 2010, pp. 33-36), 其中描述了经济危机对美中竞争的各种影响。

37. Jack S. Levy,“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实力过渡理论与中国崛起], 收录于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国崛起：实力、安全与国际政治的未来],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32), 作者认为中国只有在拥有足够的实力投放能力，能进一步扩张时，才会在亚洲挑战美国，并在较低的程度上在非洲挑战美国。另参看 Zhu Feng,“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 Unipolarity Matters”[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单极形态有其重要作用]（同书，第 53 页）声称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中国将使用软实力在单极格局内与美国抗衡。

38. 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Power, Institutions and the Western Order”[中国崛起:实力、体制和西方秩序]（亦收录于上书，第 92 页）显示加强国际体制将会如何迫使中国在体制内和平崛起，而不是挑战国际秩序。另参看 Jonathan Kirschner 文（同书，第 239 页），该文认为尽管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有时会很紧张，但是不会由于经济问题而爆发战争。

39. Robert 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中国实力的地理范围：北京能在陆上和海上扩张多远 ?],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0, pg.2), 作者声称此类行动也是冲突性的，因为它们导致东半球实力平衡迁移，“……必须引起美国深切关注。”

40. Jacqueline Newmyer,“Oil, Arms and Influence: The Indirect Strategy behind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石油、军火和影响力：中国军事现代化背后的间接战略], (Orbis Spring 2009, 207), 此文也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不久将使得美国保护台湾的努力因代价太高而无法考虑，从而让中国在这场冲突中不再需要使用武力。

41.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中国军事力量的使用：超越长城和长征],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9-91), 其中描述了中国在台海危机中的攻击能力。

42.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中国崛起：东亚和平、实力和秩序],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7-98), 其中明确声称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地区抗衡。

43. Robert Norris and Hans Kristensen,“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0”[中国 2010 年的核部队],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6 (6), 2010, 134).

44. Aaron 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不可避免吗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2), 2005, 17-19), 其中认为此等冲突的代价将导致双方审慎避免直接冲突。

45. 见注释 39 中 Kaplan 文，第 2 页，作者认为中国急于获得能源、金属和战略性矿产以满足这些需求。

46. 见注释 44 中 Friedberg 文，第 17-19 页，作者亦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相关影响。

47. 见注释 39 中 Kaplan 文，第 4 页，文章指出获取资源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48. Grecia Matos and Lorie Wagner,“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95”[美国的原材料消耗，1900-1995 年], (Annual Reviews 23-107 at http://pubs.usgs.gov/annrev/ar-23-107/aerdocnew.pdf, 4).

49. 数据摘引自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s 2010 Report to Congress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委员会呈递给国会的 2010 年报告],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10/10report_chapters.php, 183.

50. 见注释 44 中 Friedberg 文，第 19 页，文章显示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将如何采取必要步骤确保获得所需的资源；作者还声称与此类问题相关的争端“很少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51. 这些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蕴藏量数据摘引自 CIA World Factbook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手册],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52. 请参看“China to Help South Africa Develop Mineral Wealth”[中国将帮助南非开发矿藏资源], Bloomberg News, 25 August 2010.

53. Peter Lewis,“China in Africa”[中国在非洲], (The Bretton Woods Committee 2 (1), 2007, 1).

54. Bill Emmott,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竞争对手：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实力博弈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今后十年], (Orlando, FL: Mariner Books, 2009, 53).

55. Jonathan Holslag and Sara Van Hoeymissen,“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 The Search for EU-China Cooperation Towards Security Challenges in Africa”[称兄道弟的局限性：探索欧盟和中国在非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Policy Report, 30 May 2010, 文章显示中国目前从非洲进口其所需石油的四分之一以上。

56. 见注释 53，第 12 页。

57. Stephen Burgess,“Sustainability of Strategic Minerals in Southern Africa and Potential Conflicts and Partnerships”[南部非洲战略性矿产的可持久获得性以及潜在冲突和合作关系], 文中认为美国历来依赖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场力量获得其所需的战略资源，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垄断行为意味着今后无法保证能获得这些原材料，甚至有很大的落空风险。这是作者在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研究论文，登载于 http://www.usafa.edu/df/inss/Research%20Papers/2010/Report%20Burgess%20Southern%20Africa%20Strategic%20Minerals.pdf , 2010, 4).

58. 例如，请注意最近突尼斯总统阿里下台以及埃及爆发反政府暴动。

59. Steven R. David,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Civil War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灾难性后果：内战和美国利益],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书中描述了此类政府如何成为内战的起因。

60. 见注释 57 中 Burgess 文，其中描述了美国对“防务必需重要原材料”的需求，这些原材料的主要产地在非洲，而美国必须获得这些原材料，以维护其国家安全。这些原材料包括铂、钴、铬和锰，它们对于美国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极为重要，而其主要产地在非洲若干国家和俄罗斯。如果没有这些原材料，美国制造武器和其他防务系统的能力将大打折扣，从而显著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

61. 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 年 5 月，第 6 页。

62. 例如，包括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弗吉尼亚级潜艇和弹道导弹防卫计划。

63. 例如，请参看 Andrew F. Krepinevich, Jr.,“The Pentagon's Wasting Assets: The Eroding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Power”[五角大楼在浪费资产：分崩离析的美国实力基础], (Foreign Affairs 88 (4), July/August 2009, pp. 28-33). 此类“浪费资产”对今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也有影响，具体论述请参看 Donna M. Oglesby,“Statecraft at the Crossroads: A New Diplomacy”[治国之道的十字路口：新外交], (SAIS Review XXIX (2), Summer/Fall 2009, 94.).

马克·伊斯利博士，美国空军中校（Mark O. Yeisley, Lt Col, Ph.D., USAF），1990 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德州农工大学，获气象学学位并获授美国空军军官衔，遂赴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其后他就读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于 1996 年以优等成绩毕业，获卫星气象理科硕士学位。他在被分派执行一系列高端气象任务，包括“南方守望”和“持久自由”行动的战斗支援之后，赴空军指挥参谋学院进修，2004 年以优等成绩毕业，获军事作战艺术科学硕士。2006 年被选送杜克大学深造并于 2010 年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他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指挥参谋学院短期担任助理教授之后，被选送空军战争学院。伊斯利中校曾获国防功勋服务奖章、二橡叶簇功勋服务奖章、四橡叶簇空军功勋奖章、陆军职业奖章和杰出志愿服务军功章等多项奖励。他也曾多次被评为中队、大队、联队和编号空航空队级的年度优秀军官。